

· 医学史 ·

红军重视中医中药和中西医两法治疗

广州军区军医学校 靳士英

编者按 本文根据搜集的史料陈述了红军时期中医中药和中西医两法治疗疾病的情况，歌颂了红军卫生工作中重视中、西双法治病的优良传统。本刊发表靳士英同志的这一作品，旨在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对此段时期中、西医药治病史料的搜集及深入探讨。

红军的卫生工作是红军诸工作的组成部分，它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而发展，随着红军的挫折而遭受损失。从 1927~1930 年，是红军以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的时期，红军的卫生工作则以创建小型医院为依托开展部队医疗救护工作。1930~1933 年红军以运动战为主，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的卫生组织得到相应的充实，工作有所发展。1934 年 10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长征，至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红军的卫生工作遭到极大的损失。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红军的卫生工作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重新得到恢复与发展。红军的卫生工作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有许多光荣和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始终重视中医中药和中西医两法治疗。

一

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十分重视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中医中药。他们从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极为关怀卫生工作，尽一切努力预防疾病、改善伤病员的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在诸多报告、决议、讲话、文章中强调卫生工作的重要，要求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关怀伤病员，把建设红军医院，搞好预防医疗看做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建设较好的医院是巩固根据地的三大措施之一，并记载了红军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史实。中西两法治疗实际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团结协作，中药和西药的兼用。

为了解决医务人员的缺乏，红军从创建伊始就注意从地方、敌军中吸收中、西医生，党还多次从白区派来医务人员参加红军。党对医务人员关心备至。当时从军委主席、总司令到战士都没有津贴，而医务人员每月根据技术水平发给几十元津贴，军医行军出诊有马骑。《军委关于红军供给标准的规定》：“为提高技术人员技术，能鼓励和加强他们的工作”，津贴费从

五角至一百元止，按照技术的优劣，由军政首长审查规定⁽¹⁾。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优待医生条例》⁽¹⁾。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特别重视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们强调看病态度要好，要仔细热情，对伤病员关心体贴。医务人员之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自发挥所长，这些都成为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

1931 年 11 月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称卫生学校，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人员。至长征前共培养出军医班学员 181 名，调剂班学员 75 名，看护班学员 300 名，保健班学员 123 名⁽²⁾。学校倡导使用中草药代替西药，经常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制造中成药，运用中医和民间疗法，以保证医疗救护任务的完成⁽³⁾。这些学员分配到部队医院，后来都成了我军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

二

红军从建军开始就处在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和包围之中，卫生资源极端匮乏，西医药甚为紧缺，所以非常重视就地取材，开发利用中医中药。从下列史实可见一斑。

1927 年 10 月秋收起义的一师一团进抵井冈山，在茅坪将团卫生队扩建为医疗所，只有 3 名医生，收治伤病员 250 余人，没有西药，全部用中草药治疗⁽⁴⁾。根据当地居民传授的单方和本地生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轻重病人很多。

1927 年湘赣苏区在永新黄岗村建立了黄岗医院，有 4 名医生，收容千余人，医院设有草药科，经常在武功山采药，能自制丸散膏丹满足医疗需要⁽⁵⁾。

1928 年 9 月茅坪医疗所扩建为红军医院，下设两个所，所下又分内外科，内科由中医负责，外科由西医负责⁽⁶⁾。

1929 年红四军入闽作战，在蛟洋建立了红军医院，党代表是中医，吸收地方中医、西医、伤科医生各一人参加工作，还有几名民间医生协助看病。毛泽

东、朱德、陈毅、邓子恢等同志对医院关心备至，经常到医院了解情况。毛泽东同志要求医院想办法挖掘民间中草药，曾把蛟洋医院的经验和问题写入古田会议决议案的第八部分《优待伤病问题》中。红军打龙岩后，以爱华医院为基础成立闽西医院，后经小河坑、大洋坝，1932年迁至西都，称福建省后方医院，1933年又改为闽粤赣军区后方总医院，设有卫生材料厂，能制部分中西药材。收容最多达两千余伤病员，设有轻伤、重伤、轻病、重病、痢疾、花疥六个所，用中西两法治疗^(6,7)。

湘鄂西根据地，开始部队缺少卫生组织，只有几名中医，平时看门诊，战时包扎救护。樟耳坪一战，部队伤亡三百人，由于无卫生人员，贺龙同志曾亲为战士裹伤，懂中医的军政干部也参加看病治伤，全部用中草药治疗。1929年2月鄂西特委抽调3名药铺学徒出身的战士，成立了卫生队，5月克沔阳，动员中西医各一名参军，购买千元药品，办起了沔阳医院⁽⁷⁾。

鄂豫皖根据地，1929年5月在黄安成立了两个医院。刘家园医院，有中、西医各1人，看护4人，经常上山采药，用中西两法治疗；丁家埠医院只有1名中医看内科病⁽⁷⁾。

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动员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开业医生戴济民参军，由他任院长，有7名西医和数名中医组成吉安红色医院，下设四个连，一二连收战伤，由西医负责；三四连收下腿溃疡和内科，由中医负责⁽⁸⁾。

川陕根据地，对中医亦甚重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中西医两部，中医部即内科医院，曾聘川北名医多人来院工作，最多达50人。他们常针药并施，凡内科、传染科均由其治疗，备受指战员欢迎。医院设有采药队和中药房，以保证中药供应，有时往白区采购。他们还举办中医训练班，以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⁹⁾。

三

红军时期，中药是我军重要的药材来源。在各级卫生部门倡导组织下，医院部队能自采自制部分中草药。1932年10月总卫生部开办了卫生材料厂，制药车间用当地产的中草药制成丸散膏丹；水剂车间生产了急救水、龙胆酊等。1932年12月福建军区卫生部在西都也办了卫生材料厂，技术骨干由总卫生部派来，设采药、包装、制药、总务等组，工作人员40余。采药组主要组织群众上山采药，少量采购。由于敌人封锁，只能就近取材。他们先后制造了清凉油、仁丹、八卦丹、济众水、健胃丸、骨炭末、大黄粉等⁽¹⁰⁾。

红军医院和部队把采药列为经常活动。如黄岗医院，地处武功山下，他们利用这一天然条件，经常由土专家率领上山采药，方圆几十里都留下卫生人员的足迹，柴胡、常山、马兰、车前、龙胆草、大枫树叶、大黄树叶应有尽有⁽¹¹⁾。

红军指战员和卫生人员对中草药有特殊感情，在艰苦岁月里，切身看到与体验到，用中草药治好了许多同志的伤病。戴济民同志说：在药物来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一个革命医生，不能袖手旁观一个革命同志白白被病魔夺去生命，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找草药。但自己又不内行，只有向当地中医请教，不求资格深浅，那怕懂得一二味民间偏方，只要能解决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疥疮问题就是名医，就是妙药灵方。学到以后，马上传遍连队卫生员，就地采取⁽⁸⁾。他还指出，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后成立了制药厂，团有三、四副药担，营有一副药担。因为西药困难，所以采用中西结合的办法。那时提倡中药。

四

红军由于频繁作战、生活艰苦，缺医少药，伤病率很高。据统计中央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负伤率为24.34%，阵亡率为8.54%，失踪率为8.95%，疾病发生率很高⁽¹⁰⁾。

疟疾发病率约在10%左右，1934年广昌之战，部队疟疾暴发流行，有的团染疟者达80%，影响部队行军作战。指战员都是带病坚持上战场，发作一过又振作精神行军作战了。防治疟疾有的部队用奎宁，大多数用中草药，如常山、柴胡、辣蓼、水皂角、夜关门、斑鸠酸、黄狗肉、小柴胡汤、白砒丸等^(1,12)。

痢疾发病率也很高，肠道传染病占部队门诊1/3强。有时有痢疾的暴发流行，防治方法主要用中草药。如用马齿苋、马鞭草、马兰根等煎服或多吃大蒜。腹痛热敷，脱水喝盐开水。

下腿溃疡俗称“烂疮子”，红军平时有散发，但野战条件下被荆棘刺破就有成批发生。1932年夏红三军团六师被敌偷袭，部队仓促应战，被荆棘刺伤者甚多，有的团2/3发生了下肢溃疡⁽¹²⁾。治疗主要靠中医中药，如用中草药煎水捣敷；贴膏药；用大枫树叶、大黄树叶贴敷；用土龙骨、盘石龟粉研成细粉掺在伤口上。这些土法，有时竟然出现促进伤口愈合的奇妙效果⁽¹³⁾。

疥疮也在部队中流行。由于个人卫生条件差，居住拥挤，无法经常洗澡换衣，人人身上生虱子。疥疮困扰指战员。防治办法是利用部队休整时间洗澡换衣，煮衣灭虱、灭疥虫；局部涂擦硫黄猪油膏、雄黄

猪油膏、硫黄石灰水，或用花椒、蛇床子、木鳖子、苏合香之类煎水外洗等^①。

除上述四大病外，其它常见病也主要用中草药治疗。如感冒用柴胡麻黄丸，咳嗽用桔梗甘草丸、腹痛腹泻用急救水。这些药物均为就地取材，自己制造^②。

五

中医中药在长征中起了很大作用，各级卫生组织对中医中药十分重视，如在甘孜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卫生部下设中医科，科长杨云阶；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整编后卫生部也设有中医科，科长丁世芳。红三军团卫生部饶正锡部长回忆说：“从苏区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中草药手册，这本书在长征路上可帮了大忙。因为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基本都是学用西药治病，在长征路上有许多西药来源断绝，只好就地取材，从山上采草药。而这本中草药手册正好充当了我们的老师，我们不但从中学会了一些中草药识别方法，还学会了一些验方”^③。当时在三军团五师工作的谢华同志说：“没走一路采一路中草药，自己动手做成丸散。战胜了物资上的极端困难，千方百计减少部队发病，巩固部队战斗力”^④。

红军过雪山困难更大，为防止高山病和冻伤，过山前访问当地老人，选择了过山时间，要求尽可能吃饱穿暖，卫生部门广泛宣传过雪山注意事项。有的部队，每人自带辣椒、生姜、胡椒、白酒等大辛大温食物，有的部队做成急救水，每人发一瓶，或由卫生人员分散携带，以供急救。

红军过草地时药材已消耗殆尽，只能就地采中草药应用。红三军团在毛儿盖由有经验的军医率领采集了大量中草药，加工制成丸散、药精，以便在草地应用，有的部队缴获了烟土、云南白药在急救中也发挥了作用。^⑤

六

红军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医中药？究其原因不外，（1）环境因素起重要作用，红军不论是在根据地，还是行军作战，还是长征，主要活动在农村、野外，中药资源丰富，在敌人封锁包围之下，西医西药资源匮乏，因此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就成为搞好卫勤保障必不可少的条件。（2）红军指战员大都来自农村，从小就接受中医中药治疗，因此他们特别相信和愿意接受中医中药治疗。（3）红军的创建者领导者的远见卓识，重视中医中药，亲自倡导发掘传统中医和民间医伤治病的经验，号召用中西两法治疗。在组织上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强调团结协作。（4）红军的卫生领导

部门和领导干部身体力行，重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不歧视中医。（5）中医中药确有实效。

重视中医中药，实行中西两法治疗是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1985年又把中西医结合列为我军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1987年在建军60周年之际又成立了解放军中医学会，总后卫生部编设了中医中药管理处，以保证部队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健康发展。相信，红军开创的这一优良传统会代代相传，这段光辉史绩也会永被传颂。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张汝光同志赠书，并有幸多次听革命先辈饶正锡、张汝光、欧阳奕等同志讲红军中医工作历史，特衷心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129，25，181—182。
2. 张汝光，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第一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1985：73—77。
3. 李经纬。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医工作史略。中医杂志1986；（8）：52。
4. 张汝光，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第一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 1985：9。
5. 戴正华。黄岗医院。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39—42。
6. 邱林忠。闽西红军医院。见：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318—326。
7. 张汝光，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第一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1985：13—22。
8. 戴济民。红色第一分院。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33—38。
9. 徐立清。一切为了伤病员。见：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6：417—441。
10. 张汝光，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简编，第一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1985：49—153。
11. 谭尚维。回顾红军时期的黄岗医院。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42—53。
12. 饶锡正。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的一些回顾。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91—100。
13. 饶正锡。长征时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片断。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3：101—110。
14. 谢华。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片断回顾。见：总后卫生部编。创业维艰，第一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111—120。